

布迪厄场域理论视域下的葛译《生死疲劳》 翻译策略与方法

史爱清, 肖 辉

(南京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 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生死疲劳》为莫言在2012年成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效助力。目前视《生死疲劳》为葛浩文翻译策略转向期的研究对象并运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的研究较罕见。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惯习、资本、场域”分析《生死疲劳》英译本中体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深入阐释译者选取这些翻译策略及方法的原因和动机。研究发现,译者的动态惯习、葛浩文逐步积累的文化资本以及翻译场域整体态势都与《生死疲劳》翻译策略的选取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 《生死疲劳》; 布迪厄场域理论; 葛浩文;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3)02-0139-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3.02.004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H. Goldblatt's English Version of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rdieu Field Theory

SHI Aiqing, XIAO 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e English version of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translated by American sinologist Howard Goldblatt, successfully paved the way for Mo Yan to wi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2012. However, it is rare to choose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as the object of study in the turning period of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strateg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embodied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based on the three core concepts of Bourdieu's field theory—habitus, capital and field, and deeply explains the reasons and motivations for thes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nslator's dynamic habits, the cultural capital gradually accumu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 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fiel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Keywords: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Bourdieu field theory; Howard Goldblat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收稿日期: 2022-04-10

作者简介: 史爱清, 女,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E-mail: shiaiqing427@163.com

通信作者: 肖 辉, 女, 教授。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口译、笔译)与实践。E-mail: xiao1818@aliyun.com

《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获得了第二届红楼梦奖和第一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葛浩文的英译本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在西方国家同样备受关注,甚至被认为是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最重要作品之一^[1]。莫言在一篇名为《生死疲劳不是梦》的获奖演说中说:“假如我能有两本书得以流传,《生死疲劳》肯定是其中之一。”莫言又说:“诺贝尔奖的评委因为读完了《生死疲劳》,才把这个奖项授给了我。”^[2]由此可见这本书的重要地位。莫言朴实而富有戏剧性的叙事风格加上葛浩文对莫言小说创作精髓的精准把握是《生死疲劳》英译本大获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翻译研究出现文化和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研究翻译成为译学界关注的焦点。布迪厄场域理论将翻译研究置于社会背景下,试图超越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打开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另一扇大门。布迪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把“场域”界定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这就使其与传统的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的层面上有所区别^[3]。通过 CNKI 检索自 2012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至 2021 年的十年文献可以发现,研究莫言的文献数量大幅提升,其中将布迪厄理论应用于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分析的文章主要有:葛佳彬从《红高粱家族》在美国的接受情况为案例分析译作在美国赢得众多读者青睐的原因和因素^[4];邢杰等和王文娟从翻译策略角度分析了《蛙》^[5-6];汪宝荣则对《红高粱家族》和《酒国》展开翻译惯习历时研究^[7];冯全功从小说中的意象话语分析葛浩文翻译策略的历时演变^[8];等等。选取《生死疲劳》英译本进行分析的有:段文颇等剖析了译者葛浩文的惯习在文本选择上的体现,并通过亚马逊读者评论分析《生死疲劳》英译本的国外接受情况^[9]。对于将《生死疲劳》视作葛浩文翻译策略转向期的研究对象并运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的文章,鲜少有人涉及。鉴于此,本文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基础,引入三大核心概念——惯习、资本、场域,考察《生死疲劳》英译本中体现的翻译策略及方法,并分析惯习、资本和场域是如何影响译者形成翻译策略转向期的。通过此项研究,试图为《生死疲劳》英译本的研究提供新视角,并展示布迪厄场域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和译者翻译行为研究中的强大解释力。

一、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一) 惯习

布迪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根据他的社会学理论,惯习是社会行动者存在于世的一种模式,是可以持续也可以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同时具备被结构化与结构化的特征^[10],即“在实践中获得,又持续不断地旨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不断被环境塑造、又影响环境、又不断地处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之中”^[11]。一方面,惯习是结构化的,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译者通过教育、学术研究、专业经验、职业经历等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形态,而这一切又被内化为译者惯习,通过不断的翻译实践外显为译者独有的翻译风格,继而渗透在翻译的选材、翻译策略的运用以及译者主体对翻译本质的理解上。另一方面,惯习是被结构化的,即行动者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把外在的社会结构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认识,是社会化了的主体性^[11]。也就是说,译者在所处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思想形态也随之变化,译者惯习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系统。

(二) 资本

“资本”是场域定义中的一个固有特征。资本可以分为四种基本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其中象征资本由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转化而成。经济资本是指以固定产权形式持有的生产资料和货币。社会资本是指人脉资源。文化资本细分为内含形式、客观形式、制度形式。内含形式指的是一个人的精神、意志、能力等抽象品性;客观形式体现为所购买的文化产品(比如书法作品、画作、字典、书籍等);制度形式是指文化资本得到专业机构的认可,如文凭、头衔、职称等。象征资本指在某一领域的地位、名声和威望。四种资本都可以累积,并且可以相互转化。经济资本可以通过教育投资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例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因此结识到更多的作家、出版商等,并扩大他们的社交网络。在翻译场域中,知名的教育背景、优秀的语言水平和精湛的翻译技巧是译者的文化资本,与出版商的良好关系属于社会资本。译者如果善于利用自己的文化和社会资本进行成功的翻译,就更有可能在翻译领域获得声誉和地位,这样可以将其转化为象征资本。

(三) 场域

布迪厄认为个人的行为和思想无法摆脱客观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时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也受到人类的影响。因此他从物理学中借用了“场”的概念来分析复杂的社会,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一些相对独立的微小世界”组成的^[10],也就是说世界被视为一个社会大环境,在大环境中散乱分布着不计其数的“社会小世界”,它们按照自己的轨道独立运行,形成所谓的“场域”。常见的场域包括经济场域、文化场域、政治场域、哲学场域、教育场域等。在经济场域中,行为者追求财富;在政治场域中,行为者争夺权力;而文化场域又包括文学、艺术、社会文化……许多场域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翻译场域可能与各种场域相联系,包括文学、法律、历史和医学等。在翻译场域中,作者、译者、读者、书商等众多参与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形成一种“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12]。

综上所述,将布迪厄场域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其目的是分析惯习、资本、场域三大因素对译者翻译行为产生的影响。根据理论可知,译者的作品是否受到目的语读者的青睐取决于译者的惯习和资本是否符合翻译场域中的逻辑,也就是说逻辑越对应,作品越成功。

二、场域理论下对葛译《生死疲劳》翻译策略的分析

(一) 惯习与翻译策略和方法

译者惯习分为“初始惯习”和“职业惯习”两个部分。通常情况下,译者的初始惯习源于早期的成长经历,而职业惯习则是在与源语言及源文学的接触中形成的。在进入翻译场域之前,葛浩文选择了参军,并被派往中国台湾,从此以后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自发地背诵《三字经》和《礼记》等典籍,培养对中国文学的敏感度,这些形塑于葛浩文本人的初期汉语惯习将外化于翻译实践中。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萧红的作品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意味着他正式进入了“翻译场域”。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葛浩文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职业惯习——既重视“忠实”又重视“创造性”。在不断追求平衡的过程中,葛浩文的译者

惯习也是动态变化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初期的翻译惯习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翻译策略具体表现为以意译、归化、增译、改译为主,对原文进行删改和段落重组很常见;经过不断的反思、衍变,后期的翻译惯习则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翻译策略表现为注重原文的异质性,以直译异化为主,强调把原文信息原汁原味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2008年葛浩文翻译《生死疲劳》处于中后期,从“求同”为主过渡到“存异”为主,他有意通过翻译来实现丰富目标语的目的。所以,译者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为呈现文化差异所做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整体来看,葛浩文在《生死疲劳》这本书中采取了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异化与归化交融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下面从谚语、人名、文化负载词三方面举例说明。

1. 谚语翻译

《生死疲劳》中充满了诙谐生动的谚语,这正是小说语言的独特魅力所在。葛浩文在翻译时将一些带有文化色彩的谚语直接翻译出来,而不是盲目地大规模改写原文,以满足目标语言读者的阅读习惯。他认为,读者可以通过理解上下文和阅读整部小说来理解一些含有文化内涵的表达,从而自己去体会其中的含义。

例1 出水才看两腿泥!走着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3]!

译文 You don't know your legs are muddy till you step out of the water. The river east for thirty years and west for thirty years^[1]!

译者将“出水才看两腿泥”译为“You don't know your legs are muddy till you step out of the water.”原文的含义是事情只有到最后才能见分晓,译者在此处采用了直译,引导读者自己去理解其中的含义。后半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译为“The river east for thirty years and west for thirty years!”译者也没有盲目地迎合译文读者采用现成的英语表达“The pendulum has swung back”,而是尽可能保留了原作的语言形式,同时保留了原句的意象,这是异化策略的具体表现。下面的例子同样也反映了译者的态度。

例2 “不敢,”我的主人说,“我跟人民公社是井水不犯河水。”^[13]

译文 “I wouldn't dare,” my master replied. “The People's Commune and I are like well water

and river water they don't mix.”^[1]

蓝脸告诉洪泰岳(西门屯村长),他和人民公社没有关系。就像“井水”和“河水”之间没有交集一样。在译文中,葛浩文保留了原来的比喻,直接将其翻译为“well water and river water they don't mix”。这一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尽可能把原汁原味的信息传递给西方读者,这可以看出译者对忠实原文所做的努力。

也有一些谚语,译者选择了省略不译。

例3 我这哥,惯常闷着头不吭声,但没想到讲起大话来竟是“博山的瓷盆——一套一套的”^[13]。

译文 He was normally not much of a talker, so every-one was taken by surprise. To be honest, it turned me off^[1].

这里的谚语“博山的瓷盆——一套一套的”被省译。这个谚语的意图是讽刺书中一位负面人物的虚伪。“博山的瓷盆”在东北高密乡只被小范围的人所熟知,并不普遍,也并非重要物品。所以,对于译者来说把独具地方文化特色的信息传达给目的语读者是很有难度的。一旦表达传递不当,译语读者将无法体会到原作中蕴含的讽刺意味,也将违背作者的本意。于是,译者将这个谚语删除不译。葛浩文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文化意识形态,这也正是归化策略的间接体现。

总体来看,虽有极少数的谚语翻译采用的是归化,但主要倾向于直译、异化,很少直接套用与西方对等的谚语。对于有些含有复杂隐喻信息的谚语,译者会添加注释。笔者认为这一翻译行为的意图在于向译文读者展现中国谚语独有而西方文化缺失的意义。对于那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读者来说,习语的直译能够呈现原汁原味的信息,有助于他们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对汉语表达的生动性、形象性与丰富性产生更加深刻的体会。

2. 人名翻译

葛浩文在英译《生死疲劳》时对于人名的处理,主要有三种做法。其一,在主要人物表中,汉语拼音直接音译过来的占绝大多数。例如:“庞抗美”被译为Pang Kangmei,“马良才”被译为“Ma Liangcai”等。其二,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人物,葛浩文有时会添加一些解释说明。例如:“西门闹”被译成“Ximen Nao, whose name means West Gate Riot”,“蓝解放”被译成“Lan Jiefang— Liberation Lan”,黄合作和黄互助是一对双胞胎,分别

被译成“Huang Hezuo—Collaboration”和“Huang Huzhu—Cooperation”,“蓝脸”被译成“Lan Lian (Blue Face)”。其三,全书中,对待“白氏”的名字,葛浩文采用了调适翻译法译为“Ximen Bai”。调适是指改变源语语义和视角的翻译方法。

“当运用直译法译出语法正确的话语时,它在目标语中却被视为不恰当、不地道或糟糕时”^[14],则采用调适法进行翻译。比如,小说中白氏是西门闹的正妻(娘家姓为“白”,夫家姓为“西门”),在西方国家女性婚后采用丈夫的姓氏,所以英译本回译为“西门·白”。除此之外,译者在主要人物表中做了一些处理,源文本共罗列了23个人物,而译文删去了蓝开放、庞凤凰、西门欢等,只留下了17个人物。删去非必要人物和非主要叙述者这一翻译行为,实为归化策略的伸展,看似与“忠实”相悖,实际上为了减少读者因人名带来的阅读障碍,从而提高译本的可接受性和可阅读性,也是忠实于读者的一种做法。

3. 文化负载词翻译

小说的创作背景是高密东北乡,莫言运用了大量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和时代特色的词,据杨莎莎统计,在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葛浩文大量使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占总数的48.70%^[15]。

例4 “他还是我娘的干儿子、我的干兄弟呢!”^[13]

译文 He was my mother's “dry” son, my “dry” brother.^[1]

在中国有着认养名义上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的习俗,以表示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

“干儿子”也是汉语中的常见表达,译者对此采取直译的翻译方法,译为“dry son”“dry brother”,没有解释真正含义。译者期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上下文来感受原文的含义,这点存在异议,有人认为不详细解释真正含义是一种文化缺失,不利于传统文化传播。但笔者认为,这是葛浩文翻译策略转向期想要展现的异化观,他开始更加忠实于原文,注重源语文化的异质性。

文中还有一些文化负载词也都采取了直译,例如“供销社”译为“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四清运动”译为“four clean-ups campaign”,“黄泉路”译为“yellow spring of death”,“红卫兵”译为“the red guards”,“黑典型”译为“black model”,“大跃进”译为“the great leap forward”。

其次,在直译会造成目的语读者阅读困难的情况下,译者采用了意译法。据杨莎莎统计,意译法占文化负载词翻译总数的28.70%^[15]。

例5 “什么干娘、湿娘,我们从来不搞这一套庸俗关系。”^[13]

译文 Nominal mother, normal mother, those vulgar views of relationships never played a role in our family.^[1]

在原文中“干娘、湿娘”属于一种故意模仿的表达方式,多用于讽刺。“湿娘”是莫言在这部小说中根据语境新创造的一个词,它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为了避免阅读障碍,葛浩文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作用,大胆地改写了原文的表达方式,采用了意译的方法,翻译成“nominal mother, normal mother”,运用归化策略但仍然传达了原文的形与神。

文中还有一些文化负载词也是采用意译,例如“太岁”译为“wandering god”,“惊堂木”译为“gavel”,“阴曹地府”译为“bowels of hell”,“关帝庙”译为“the God of war temple”。

葛浩文在翻译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负载词时,绝大部分都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和汉语语言魅力,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文化负载词采取了意译、归化的翻译方法,表明译者为了达到译文的最佳状态,在忠实再现原文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又兼顾了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二) 资本与翻译策略和方法

资本的积累产生质的飞跃,也会影响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何元媛^[16]把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3年至1999年,属于萌芽期,葛浩文的英译本刚开始进入西方英语世界崭露头角,期间有两部译作分别是《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第二阶段是2000年至2007年,属于酝酿期,这一时期新译本数量不多,有两部长篇作品《酒国》和《丰乳肥臀》,但是出现了译著的多次再版;第三阶段从2008年开始至今,属于黄金期,《生死疲劳》正是迈入黄金期开始进行翻译策略转向的第一部作品,随后还有《檀香刑》《四十一炮》和《蛙》。从布迪厄场域理论文化资本的角度来看这一变化,葛浩文早期在台湾学习中文培养了一定的文学素养和思维模式,这是文化资本的内含形式,而后攻读了中国文学硕博班

获得了学历,这是文化资本的制度形式,加上他在第一、第二阶段出版了20多部译作,其中包括作家萧红、苏童、贾平凹、毕飞宇等的作品,这是文化资本具体化的客观形式,都对他的翻译策略转向带来一定的影响。他出版多部英译本以后,结识了不少作家、代理人、编辑以及出版社,从而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这都成为了他的社会资本。他不再是翻译《红高粱家族》时的无名之辈,“被迫”去迎合西方读者喜好,大幅度删减、改译文本的情况大大减少了,同时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有读者群,以及如何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翻译能让读者更感兴趣。葛浩文和莫言的关系也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他在译本编辑过程中与原作者莫言进行过不计其数的探讨和协商,译者在考虑读者接受程度的基础上承担了编辑的角色,具体表现为《生死疲劳》中主要人物表中的6个非必要人物被译者删除,谚语简化省略,文化负载词删减等。

(三) 场域与翻译策略和方法

葛浩文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受到翻译场域影响,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主观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的近20年,亚裔文学地位边缘化的现象大大好转。在译入文学方面,90年代以来,英语国家出版社开始大量引进中国文学作品。据鄢佳统计,从1990到2011年,商业性出版社共出版了97种中国现当代小说,10个知名大学出版社共出版63种中国现当代小说^[17]。虽然没有到2008年为止详细的数据,但我们可以发现商业压力较小、学术使命较重的大学出版社的数量从无到有,这为中华文化传播提供了优势,可间接推断出中国文学翻译场域的整体态势是向上的。且葛浩文翻译《生死疲劳》时,正逢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对外交流需求大增。在这种大背景下,浅尝辄止的泛泛之谈不再能满足美国读者的胃口,他们更期待了解细致、真切的中国动态。葛浩文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翻译场域的变化,逐步调整翻译策略和方法,开始注重传达莫言小说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差异性特征并突出小说本身的文学性特征,所以选择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归化异化交融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不再刻意迎合英语读者,而是努力将莫言小说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结语

葛浩文翻译的《生死疲劳》是莫言获得诺奖的重要推手,研究这本书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对中国文学作品外译具有启发性。本文引入布迪厄场域理论三个支柱概念——惯习、资本、场域来分析《生死疲劳》英译本中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原因和动机。《生死疲劳》正是葛浩文翻译策略转向期的一部译作,他在这段时期倾向于使用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异化与归化交融的翻译策略,忠实是他的第一原则,他在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同时注重传达中国文化。究其原因,由初始惯习和职业惯习构成的译者动态惯习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所坚持的“忠实”与“创造性”并存的翻译理念也直接影响了翻译策略的选取。此外,葛浩文逐步积累的资本以及翻译场域整体态势与翻译策略转向期的形成也有着密切关系。葛浩文为沟通中西文化和表现文化差异所做出的不断调整和努力,值得每一位译者学习。

参考文献:

- [1] MO Y.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M]. Translated by GOLDBLATT H.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11.
- [2] 莫言. 第二届“红楼梦奖”首奖作品《生死疲劳》获奖感言[EB/OL]. [2022-02-12] <http://redchamber.hkbu.edu.hk/tc/winners/2nd/dream>.
- [3] 李小冰. 布尔迪厄文学场域视角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J]. 山西青年, 2021(14): 136-137.
- [4] 葛佳彬. 布迪厄社会学视角下《红高粱家族》英译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 [5] 邢杰, 陈俊娜. 场域理论视阈下葛译《蛙》翻译策略解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3(2): 59-67.
- [6] 王文娟. 布迪厄场域理论下的葛浩文《蛙》翻译策略研究[D]. 北京: 外交学院, 2017.
- [7] 汪宝荣. 葛浩文译者惯习历时变化考察——以《红高粱家族》《酒国》为中心[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1(1): 17-25.
- [8] 冯全功. 葛浩文翻译策略的历时演变研究——基于莫言小说中意象话语的英译分析[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 40(6): 69-76.
- [9] 段文颇, 魏萌桦. “惯习”“资本”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研究——以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为例[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83-89.
- [10] 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 [11] 布尔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 [12] 刘昕彤. 布迪厄社会学视角下《骆驼祥子》法译本翻译策略研究[C]//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第十三届研究生学术研讨会、第三届外国语言文学博士论坛论文集. 厦门: 厦门大学, 2020: 219-227.
- [13] 莫言. 生死疲劳[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 [14] VINAY J P, DARBELNET J. 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95.
- [15] 杨莎莎. 基于语料库的《生死疲劳》中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0(10): 126-130.
- [16] 何元媛.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发展变化——以《红高粱》《酒国》《生死疲劳》为例[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 2017(6): 154-157.
- [17] 鄢佳. 布尔迪厄社会学视角下的译者葛浩文翻译惯习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3.

(编辑: 朱渭波)